

邓伟：让摄影成为艺术

○ 本刊记者 关悦

二十几年前，他出版了《中国文化人影录》，抢救性地拍摄下了极具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珍贵影像，填补了中国名人肖像摄影的空白。

十几年前，他凭借个人的毅力进行环球世界名人拍摄。创作了百余位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们独具魅力的肖像作品。这些作品曾在联合国总部以《和平肖像》为题展览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与认可。百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。

三十年来，他坚持在艺术领域研究与探索，从未停止摄影实践。他在回到祖国后，先后创作了《爱琴海的太阳》、《北京人》、《中国人》摄影专题，展现他镜头里的世界与中国。作品先后在首都博物馆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成功展出。

近年来，他重回校园。作为清华教师的邓伟，以扎实的理论基础、谦卑真诚之心，与学生们分享他在多年实践中积累的知识与见解，还有镜头以外对生命的感悟。



邓伟

著名摄影家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，英国皇家摄影学会荣誉高级会员。青少年时期师从画家李可染先生、美学家朱光潜先生。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，1982年留校任教，曾担任故事影片《青春祭》等数部影视作品的摄影师。上世纪80年代，拍摄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名人肖像摄影集《中国文化人影录》，填补了中国名人肖像摄影学科的空白，被海内外誉为“为中国完成了一项文化工程”。90年代到本世纪初，完成环球世界名人拍摄，以独特的视角刻画百余幅世界杰出人物的肖像作品，足迹遍及五大洲，笔记百万余字，被誉为“人类摄影史上的创举”。同时在国内外大学讲学，传播、倡导“文化摄影学”理念。曾获中国摄影金像奖、香港电影金像奖、希腊“索菲”奖、美国“PPA国际摄影杰出贡献奖”等奖项。主要论作：《中国文化人影录》、《摄影造型法则》、《瞬间造型》、《学画记》、《邓伟日记》、《邓伟眼中的世界名人》、《邓伟看世界》、《邓伟摄影作品集》、《邓伟摄影艺术精品》、《DENG WEI AND FIFTY FACES》、《八年》（1-3卷）、《WIND FROM CHINA》、《邓伟文集》、《中国美术馆藏邓伟捐赠作品集》、《爱琴海的太阳》、《追逐太阳的光影》、《北京人》、《中国人》等。

“心灵捕手”

1993年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办公室。

基辛格半是得意、半是挑战地看着眼前陌生的中国小伙子邓伟。他刚刚拒绝了邓伟选择的拍摄地点，故意把他领到了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，因为他很清楚，邓伟习惯在自然光下进行拍摄。邓伟略一思索，说：“基辛格先生，我为您造一个太阳。”随后他请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基辛格旁边安置了一盏落地灯。邓伟又请基辛格做一次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：摘下眼镜，把一个镜腿叼在嘴里。基辛格又拒绝了。一瞬间，邓伟抓住基辛格流露出的既聪明又狡黠的神情，按下了快门。

拍摄一结束，基辛格马上拉开门想走。邓伟立刻站到门前，直视着基辛格说：“您还不能走，请您为照片留一句话。”基辛格略一停顿说，我对中国最难忘的记忆，就是我们签署《上海公报》的那一天。说完夺门而出。走几步，他又回头摘下眼镜做出咬镜腿的招牌动作，对邓伟“顽皮”地说：“邓，别忘了多给我寄几张照片。”

2004年12月，联合国总部举办“和平肖像——邓伟世界名人肖像艺术联合国展”，基辛格专程从法国飞回美国前去祝贺。在众多媒体面前，他毫不吝惜自己对邓伟的赞美。临别，他突然返身拥抱了邓伟，并深情地说：“孩子，我们何时还能再见面？”

邓伟说，他想记录的，就是这些名人光环之下真实而平凡的瞬间。而他亦用他的执着和真诚征服了拍摄对象。

在他的镜头里，曾留下钱锺书、俞平伯、冯友兰、茅盾、冰心、李可染等诸多中国文化名人的经典影像，也曾为拉宾、里根、基辛格、穆沙拉夫、贝聿铭、杨振宁等世界风云人物记录下传神瞬间。

邓伟从小在北京长大，父亲是文化学者。从小，父亲为了训练他的意志和耐性，经常带他从小新街口家中徒步走到香山。青年时期，邓伟得以拜李可染为师学习中国画、随从朱光潜学习西方



季羨林



梁激溟

美学。当他18岁考上电影学院，刚一接触到摄影，第一个念头就是给自己的老师拍照，以报答老师平日里的教导之恩。从此，他逐渐萌生出对肖像摄影的浓厚兴趣，一发而不可收。19岁那年，在父亲的建议和策划下，邓伟开始利用课余时间，为当时中国著名的文化人拍照。虽然其中有一些是通过父亲的介绍或辗转引荐，但大多数时候，他都只能拿着电影学院的介绍信和学生证，敲门去毛遂自荐。也正是这样执着的敲门，让他和钱钟书等老一辈文化学者成为忘年之交。

1986年，邓伟历时8年完成的《中国文化人影录》出版，因其蕴含的巨大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，被海内外誉为“为中国完成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文化工程”。

在拍摄中国名人的计划完成后，邓伟又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：环游世界去拍摄世界名人。当时，身边的人都把这看成是一件“不可能的任务”。是他的父亲，在思考过之后送给他四个字：知行勇毅。而这四个字，也成为了邓伟行动的真实写照。

1990年5月31号——邓伟至今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。那一天他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，并从那里开始了布满荆棘与惊喜的旅程。

在长达8年的环球名人摄影旅程中，困难和危险几乎伴随着邓伟前行的每一步：

为了拍摄到美国总统里根，他坚持写了8年邀请信；

拍摄美国哲学家奎因时，遇上罕见的暴风雪，“雪墙”将奎因家门口完全堵住，邓伟就用手扒开雪前行；

当他结束在以色列的拍摄，准备乘机离境时，便衣警察突然高喊“有炸弹”，拉起他就跑。邓伟却不顾一切回身抱他的摄影箱，因为里面有包括拍摄总理拉宾在内的全部底片。他拿到后跑开不久，座椅边的垃圾箱就爆炸了，距离他刚刚坐过的椅子只有半米远。

邓伟是迄今为止第一位环球拍摄世界名人的摄影家。因为对文化交流和摄影艺术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，他先后获得了希腊“索菲奖”和“PPA国际摄影杰出贡献奖”，其作品被中外数家国家美术馆、博物馆、图书馆收藏。

2007年，邓伟应聘进入清华大学，成为一名教授。这又是一个让很多人吃惊的决定。也有人惊呼：进入学校后他的摄影风格发生了很大转变，由原来的学院派经典变得更“轻松、当代”了。对这些评价，邓伟都谦逊地笑笑。期末结束，他的学生在课程结语中说：“感谢邓老师选择了摄影，用照片为世界留下许多美好的瞬间；感谢邓老师选择教师这一职业，用您的人格魅力影响您的学生。”

在教学中，邓伟继续实践着，做着新的探索与追求。世界的距离对他来说，不在远，只在心。

“one life, one go”

记者：您拍摄这些照片背后的艰辛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。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您一路走来？

邓：很多人说是信念，但我觉得摄影将会是我一生的兴趣。我对自己的评价是“one life, one go”一生要努力做好这一件事。

记者：在您环球拍摄的过程中，有没有想过要放弃？

邓：有。我第一个成功拍到的世界名人是新加坡资政李光耀，拍完时我特别激动，在圣淘沙的海边坐了一夜，心里一直在激烈地斗争：已经三年未曾回过家了，是继续拍摄，还是放弃？但第二天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知道，我会继续。

记者：您有没有统计过，这些年您一共拍过多少照片？

邓：我每一次的拍摄数量并不多，虽然我从事摄影有三十多年了，但我保存下来的底片只有几百幅。

记者：为什么？

邓：我一直秉承的观点是“洛阳纸贵”、“惜墨如金”。特别是在创作时，当我确定了，才会拍下一两张。因为在按动快门时，我心里已经对画面将呈现出来的效果有所把握。如郑板桥所说：“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。”画画的时候，意在笔先，摄影时也是这样。

记者：那您在拍摄之前都会做什么样的准备？

邓：比如拍摄乔治·布什，我会先从网络、电视上搜集他的动态画面，研究他的基本造型、肢体语言，看他有什么典型性动作。静态的画面资料就更多了。像英国《泰晤士报》，美国的《时代》周刊、《今日美国》等等，上面常会有重要人物的新闻照片，这些照片从不同视角拍摄，也会传递给人不同感受。文字资料也是至关重要的，我会读布什的传记、专访、他的就职演说、出访各地的演讲，甚至美国政府发布的年度报告，这些都有利于我对他的深入了解。只有我了解了，才愿意、也能够去表现他。



冰心



杨振宁



朱光潜

可以说，拍摄一个人物的时间可能只有十分钟，但之前的准备时间可想而知。对一个人物的理解和表现，并不是只在按动快门的瞬间，而是在拍摄之前通过大量的准备工作，已经对他有了充分解读，这个过程也是研究最终呈现方法的过程。拍摄之前，这幅作品已经映像在我脑中，这也是在较短时间内，我可以从容拍摄的原因。

记者：摄影的本质是记录真实，但电脑技术、数字技术的出现导致摄影已经不同于其最初的定义了，因此有一种说法是“摄影已死”。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？

邓：在不同时代，摄影有着不同的定义和创作方法。在19世纪40年代，最初的摄影是在镀有碘化银的钢板上曝光、显影后呈现出的金属负

生学到的是什么？

邓：除了摄影技巧，最重要的还是人格的塑造和知识结构的完善。摄影本身是一门学科，同时也是其他艺术专业学生的必修课。我的课堂并不只针对摄影专业的学生，清华的教育是开放式的，知识的交流是没有领域界限的。我希望摄影可以更加充实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。

至于人格上的塑造，完全是无形的。比如课上，我会尽量照顾到每一位同学，通过提问、互动讨论等方式，鼓励每一位同学发言。下课时我会把学生们留在教室的空水瓶、食品袋都收拾起来，把黑板擦干净。原因是希望给学生们营造一个温暖的心理环境。有一个学生的结课留言给我印象很深，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这种观点。他说，“第一堂课，邓老师批评了我们几个迟到的同学，但却很高兴地为我们说出了迟到的真实原因而鼓掌。做一个诚实的人，一个会为别人的诚实而鼓掌的人，这是我学到的第一课。”

记者：作为摄影家，您是成功的；那作为一名教师，您觉得自己成功了吗？

邓：教师的职责是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目的是让学生获得更多知识和技能。我尽力对所教过的每一个学生负责，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愉快。多年来，我在拍摄中积累了很多艺术创作的的经验，同时采访过许多对人类做出贡献的人，他们给予了我启迪和知识，我愿意把这些再传递给学生们。作为教师，我还有很多需要做的功课。

记者：教学是否会给您的摄影工作带来影响？您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？

邓：现在对我来说教学是第一位的，教师的职业督促我不断学习，获取领域中最前沿的理论知识及讯息，这个过程与以往不同，我会更加严谨地深入思考、整理后再讲授给学生们。我之前拍摄并出版的《爱琴海的太阳》、《北京人》、《中国人》，都是利用假期时间拍摄、编辑的专题。摄影实践让我有新的经历和新的收获，在课堂上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讲授给学生们，对我而言自己也有收获。

记者：您觉得中国在摄影教育方面发展得如何？

邓：这也是我最近正在做的一个调研，关于学校教育摄影美学体系的构建与研究。通过选择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调研，了解目前有多少城市的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开展了摄影教育，以及这方

面的师资情况，进行数据整理，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立基础摄影美育教育的建议。

台湾在早期摄影美育教育方面做得比较完善，在幼儿园阶段就开始组织摄影比赛了。现在很多小学生就已经有手机了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方便的摄影工具，关于早期摄影美育培养和教育我们还有待提高。

记者：对于那些和您一样想追逐摄影梦想的学生，您有什么样的建议？

邓：相信自己的感觉，尽自己的力量。



基辛格